
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

谭继和^{*1}

【摘要】: 丝绸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中华衣食住行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步进步到文明形成时期的产物。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它的产生是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同步的，也是多源的。如同中华文明的起源为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形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多个地域不同的起源。“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中华多源而又多元的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汉唐以来，天府四川更因蜀锦、蜀绣、蜀布、漆器及其它特色商品贸易而成为诸丝绸之路上独放异彩的光亮地带。历史经验证明，天府四川离不开诸丝绸之路，诸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天府四川。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体系中，天府四川同样会有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古蜀；天府；丝绸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7) 04-0026-7

丝绸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中华衣食住行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进步到文明形成时期的产物。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它的产生是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同步的，也是多源的。如同中华文明起源为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形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也是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多地起源。“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中华多源而又多元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一、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

由皮革麻布缝制，进步到丝绸纺织，是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早在上古采集渔猎时代，人们因御寒衣物遮身被体的需要，就产生了揉制皮革和搓制、缝制树皮草茎的技术。最初是搓制、缝制打猎捕鱼的网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①，后来学会骨针缝制兽皮树衣。早在十万年前山顶洞人遗址即发现骨锥。巴蜀大地上，距今四万年资阳人鲤鱼桥遗址发掘出智人使用的骨锥，这都是最早缝制技术的物证。^{②③}

¹ 作者简介: 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² ① 《周易·系辞传下》：“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载陈德述《周易正本解》第306页，巴蜀书社2012年12月出版。

³ ② 资阳人遗址出土骨锥，载刘胜俊《资阳人》第8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资阳鲤鱼桥遗址出土骨锥

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石（陶）纺轮、原始的水平织布机、麻葛平纹织布，这是现代纺纱织布技术的起源。与此同时，在自然条件、气候条件适宜野蚕、柞蚕生长丛集的地域，发现蚕丝可作布料，这就产生了丝织。这是最早的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丝织印记和遗存，证明只有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产生了丝织技术，其它国家没有这项技术。直到公元 552 年拜占庭派景教僧人到中国把蚕种偷偷藏在竹杖内才偷运回国，这是西方世界养蚕缫丝的开始。又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养蚕缫丝法才引入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先后成为欧洲丝绸中心，都是这之后很晚的事。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早了四千多年。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养蚕缫丝发源地。^[1]在五帝时代，即 5000 年前即已发明养蚕缫丝。传说最早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是黄帝正妃嫫祖。嫫祖的“嫫”字，也寓意女性缫丝累累一团之义，指最早发明人是女性，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传承是一致的。^①嫫祖属西陵氏，“西陵氏劝蚕嫁，亲蚕始此”^②。嫫祖为黄帝把丝绸制成五彩印染锦帛衣服，“黄帝制五色衣裳”“垂裳而治”^③，“锦裳”就成为黄帝始创人文的文明标志。丝绸技术，由黄帝与嫫祖推广到九州各地，故很多地方供奉嫫祖为丝绸行业始祖。根据记载，最早供奉嫫祖为“先蚕西陵氏神”的习俗，起于北周时期^[2]。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丝和丝织品就成为中国的特征，扬名海外，那时希腊人就已用“丝国”（赛里斯）^④来称呼中国。到汉唐时期，丝绸就成为中外商贸与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并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⁴ ① 嫫祖：《大戴记》、《史记》作“嫫祖”，《世本》王谟辑本、秦嘉谟辑补本、陈其荣增订本、张树枏集补注本、雷学淇校辑本，均作“嫫祖”，《汉书人表》又作“嫫祖”，诸“嫫”字互通，字源于“累”。《说文解字段注》第十三篇上 695 页释“累，缀丝理也”，“有条不紊是曰累”。由此可见，嫫乃女性缫丝缀理之意。嫫祖为缫丝织锦第一人，故用“嫫”为名。

⁵ ② 各种《世本》辑本均载“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产青阳及昌意。”见《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 年 12 月出版。西陵氏之地望不确，或指陇西，或指楚地之西陵，或近于蜀。西陵氏养蚕，最早见于《淮南王蚕经》。

⁶ ③ 《周易·系辞传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对此句陈德述注云：“高亨认为‘垂’当借为缀。缀，缝也。垂衣裳，缝缀衣裳，上服为衣，下服为裳。”按：此垂衣裳，即指缝缀丝绸衣裳。见陈德述《周易正本解》第 307 页，巴蜀书社 2012 年 12 月版。

⁷ ④ Serica, Sera, Seres, Sinae, 皆指丝国，皆为希腊、罗马人著录，见何健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书局 1939 年出版，第 1 页；何健民认为：Serica，似指中国北部古地名，而 Sera，似指长安。又见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 61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 7 月出版。李认为“塞里斯”，系从古希腊文塞尔（Ser，意为丝）转来。又见杨宪益《译余偶拾》第 148—149 页，三联书店 1987 年版。杨认为“据脱烈美《地志》看来”，“Seres 当即古代的蜀国”，“Sinae 当即古代的滇国”，“蜀国的蜀本为织丝蚕的原字，此亦与 Seres 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

二、丝绸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多地起源

丝绸的织成是极不容易的，它受制于产生地域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讲，它包括养蚕、制种、缫丝、织帛、擘锦、练漂、治絮、染色等全套技术。从自然条件讲，它需要适宜养蚕的桑树桑叶生长和育蚕的自然条件，故栽桑养蚕习俗的兴起，最初主要在自然条件好的黄河中下游，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全国多个养蚕丝织起源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地域的出现，又多与《禹贡》记载的全国九州中有六个州贡赋上交的丝织品有关^⑧。目前，考古发现与丝绸有关的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多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 7000 年前）出土蚕纹牙彫、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前）出土蚕茧、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前）出土丝麻织物残片、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今约 4750 年）出土绢片丝线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丝、麻两种原料的织成品。丝织品包括绢布、丝带和丝线，由家蚕丝织成，有单丝绞捻、粗细经纬相纺、平纹组织等样式，说明五、六千年前在长江流域已产生养蚕织绸的先进于世界的技术。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印证，说明在我国丝绸纺织技术有多地不同的始源，同时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很多地方有嫫祖创养蚕制丝绸的传说。很显然，这些传说是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全国多个文化地域多处丝绸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考古发现丝绸遗址早的有六七千年，而嫫祖传说不过四五千年，时代晚得多，这说明在丝绸生产的历史过程中才产生嫫祖传说，多地域的丝绸生产是嫫祖传说产生和演进的肥壤沃土。

三、天府是丝绸文明诞生的一个重要摇篮

“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丝绸文明起源的一个摇篮。丝绸起源于“天府”，首先是因为有良好优越的桑蚕自然条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战国宴乐狩猎纹铜壶，在其第一层绘有弋射、采桑图，^⑨可以看到妇女着丝裙，攀树上，坐枝头，采桑叶的生动图像。成都新都区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描绘有桑园和柴门，一高髻妇女手执长竿采桑叶的形象。^⑩虽然这是战国秦汉时的作品，但它是西蜀自古以来就有桑麻遍野，“擅桑麻之利”“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天然条件的说明。近几年在成都都江堰市挖出的一株桑树乌木，就是几千年西蜀适宜栽桑的明证。

其次，蜀中自古喜欢养蚕。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时期铜戈，上面刻画有蚕纹，说明这是养蚕习俗的产物。^⑪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蚕字。甲骨文蚕字作^⑫，而蜀字则写作^⑬，证明蜀字形是从蚕字形孳乳出来的。《诗经》有“蜎蜎者蜀”

^⑧ ① 《尚书·禹贡》记载下列六州贡奉丝织物：1. 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郑注云：“织染，丝织之也。”《说文》云：“锦，襄邑织文也。”“织文”是丝织品。2. 青州，贡“厥篚纻丝”。3. 徐州贡“厥篚元纁纁”（丝绸祭服）。4. 扬州贡“厥篚织贝”，织贝乃锦名。5. 荊州，贡“厥篚元纁纁组”，即元衣纁裳，丝织。6. 豫州贡“厥篚纁纁”，“厥贡漆枲絺紵”，皆丝织类。参见孙星衍注：《尚书今古文注疏（上）》卷三禹贡第三上第 10 页至第 40 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0 月出版。

^⑨ ② 成都市郊百花潭中学 10 号墓出土战国“水陆攻战”错银铜壶，共 4 层 8 组图案，第一层左组是竞射图案。右组为采桑图案。参见《成都市志·文物志》第 193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又参见刘志远等著：《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 页。图四三铜壶“采桑图”（临摹），描摹 16 个妇女采桑状，有爬上桑树采桑叶的，有在桑树下拿着络绳桑篮接桑叶的，有提着桑篮来回运输的。

^⑩ ③ 新都县（今新都区）收集《桑园画像砖》，见刘志远等著《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第 42 页，图四二《桑园》（拓片）。另，在成都市郊、彭县、郫县等地均出土有“桑园”画像砖，参见《成都市志·文物志》第 222—223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⑪ ④ 成都市交通巷 1978 年出土西周蚕纹铜戈，两面均铸有蚕形图像，四周环以云雷纹和几何形纹，其时代均相当于西周时期。该蚕纹形状，头大而眼突，身体弯曲作蠕虫状，其周围是圆圈符号，大概是表示采桑叶的生产工具。参见《成都市志·文物志》第 191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按：此蚕形图案，应是蜀字的形象。

^⑫ ① 蚕字，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下）》第 509 页，卷三·八（页），载刘鹗：《铁云藏龟》一八五·三，罗振玉《殷

的诗句,《说文解字》释为“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蚕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葵即桑字。单独的蚕形是甲骨文的“蚕”字。而其身蜎蜎,卧在桑叶上,则是“蜀”字,可见“蜀地”“蜀国”的得名是来源于西蜀喜栽桑养蚕的习俗。^{③14}

蜀地的丝绸业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两个条件具备优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的得名,还可看出蜀的蚕丝业起源于上古渔猎时期。蜀先祖有蚕丛、柏灌、鱼凫三王和杜宇、开明二帝,共五代。^{③15}这五代先祖名称都与文明演进次第密切相关。^{③16}“蚕丛”是野蚕丛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虫氏族,最初即食野蚕,后来发现野蚕吐丝的功能,即把它培养为家蚕,培训出蜀氏族治茧缫丝的本领,这就是蜀地丝绸的起源,相当于蜀的采集渔猎时代。蚕丛氏的祖地,相传在岷山蚕陵,今茂县有“蚕陵重镇”古碑,后为地震水灾所没。^{③17}柏灌、鱼凫的得名,为治水捕鱼经济生活的代称。杜宇为巴蜀农祖,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代称。开明则是因进入高级农耕文明,更为开化,故而得名。由此可见,古蜀五祖的得名,刚好与文明演进的次第相符,其首为丝绸文明,这是上古时代,蜀人经历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忆,是表现为传说和神话的古蜀人祖先的自成一系的口述历史。它作为活态文化基因,一直流传到现在。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有蜀女为桑叶所包裹化为蚕,变成青衣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蚕丛时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蚕丛都蜀,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③18}。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

虚书契前编六·六六·三》,后编上二八·六,均为殷代甲骨文“蚕”字形。按:《说文解字》释:“蚕,任丝也。”据李学勤主编《字源》,蚕指蚕蛾科和天蚕科昆虫,能吐丝结茧。小篆作蠶,椎简化为楷书蚕,今为简体字。见《字源》第1167页至116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¹³ ② 蜀字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下)》第507页,著录有三个时期的“蜀”字:殷商甲骨文,有乙九九、明二三三〇、乙一〇一〇,此时期蜀字皆为突出眼睛,弯曲其身的形状;周代时期则有周原卜骨六八、班簋蜀字,此时期皆在其蜎曲身内加有虫字。战国时期则有石鼓和涪陵小田溪铜戈上的蜀字,皆加有虫字在内。蜀字见《诗经》卷一国风·幽·东山。参见吴闿生《诗义会通》第120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上海出版。吴注“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一句,认为蜎蜎,蠋貌。蠋,桑虫也,《说文》引作“蜀”。按:古文字中“蜀”字,为“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下从虫”。(见《说文》)。西周后始加虫字,成“蜀”。“葵”即“桑”字。

¹⁴ ③任乃强《蚕丛考》认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载任乃强先生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¹⁵ ④扬雄《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太平御览》引作凡四千岁),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二扬雄《蜀王本纪》,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¹⁶ ⑤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认为蜀人祖先五世相及,其名称及其传说,“分明是指蜀人生活方式所经历的五个经济时代:蚕丛氏以桑蚕为特征,是采集时代。柏灌氏是狩猎时代,鱼凫氏是渔猎、畜牧时代。杜宇又号土主,教民耕作,是发明农业的时代;又号蒲卑,即制服(蒲即服)卑下湿地之意,是排水治理湿地发展初级农业经济的时代。(按:服卑筑邑,故曰郫。)开明是城市文明初期鼎盛,进入生产经济的时代。”以上载谭继和《巴蜀文化辨思集》第53—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¹⁷ ⑥任乃强先生《蚕丛考》:“窃疑蚕丛之义,谓聚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之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cù),语言作丛(cóng)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蚕丛也。”“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著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蚕丛氏居于蚕陵,即蜀郡蚕陵县,今松潘县叠溪,1937年地震后变为叠溪湖。”该文见任乃强先生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20页—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¹⁸ ⑦据任乃强先生《蚕丛考》分析,“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应是产生于唐时的传说。据《太平广记》,该故事乃高辛氏时,因蜀女之父为贼所掠,蜀女誓众:“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奔走救父归,父不肯嫁女,射杀马曝其皮,马皮捲女于桑间,女化为蚕,食桑成茧。女子即为蚕神“马头娘”。任先生指出该故事系隋唐时之马明王为蚕神的传说与蜀人蚕丛故事的结合,它源于春秋战国时“蚕马同气”,“谓蚕神为马首”(《荀子·蚕赋》)之说,故《协律辨方书》说,“天马为丛神,

从历史文献看，黄帝部族与蜀山氏部族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均以养蚕治丝著称。黄帝嫫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僕淳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①9}高阳氏降居于若水（青衣江），其后裔夏后氏大禹兴于西羌^{②0}，夏代中期君主杼回归石纽^{③1}，末代君主夏桀娶岷山二女婉、琰，^{③1}均说明从远古时代到夏代，两大部族丝绸文明密切交流互鉴的关系。

蜀锦与蜀绣是蜀丝绸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它的渊源很早，蜀地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就发现刻有纺织印记的绳纹、网格纹和方格纹。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指挥街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均出土有陶、石纺轮，说明纺织技术发生很早。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发现的巨型青铜立人像，其头戴上下两层华帽，衣饰分内中外三层右衽华服，配有编织授带，上有华美的织纹，前后后背均织出有联珠饰的龙纹、回纹和兽面纹，还有体现蜀人仙鸟崇拜的丝织鸛鸟形象，线条流利，黻黼华亮，图案复杂，想象丰富。但因是青铜造铸像，其塑像创作的人物原型，特别是衣饰原型，模仿的是什么，颇费猜测。可惜各家著录皆未分析其衣着质料，是麻类，是绢类、帛类，还是丝类、绸类，遂成疑团。不过，根据我们对中国纺织发展史规律和特征的认识，能绣出如此精美复杂图案，一般麻类质料衣服是绣不出来的，非锦衣、绸衣不可，这说明三千多年前蜀地即有了染丝而织成文章的锦与绣，应该说这就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④22}到秦汉三国时代，成都蜀锦蜀绣繁荣发展，成都成为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三大中心之一，与齐鲁的罗纨绮縠、河南襄邑的美锦纨绔比美，^{⑤23}甚至超过齐鲁，成为蜀国重要的经济和军费来源，故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④1}蜀锦是三国蜀汉对外贸易的专利品，是决敌致胜的国力保证。^{①24}

为掌蚕之命神”。到明清时蚕神与青衣神传说结合，故又谓之“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任先生考证上述诸传说来源后，认定此乃青衣羌的祖说。甲骨文有羌字，写作“羌加系”的形象，乃“表示卖丝的羌人”，是羌人居于岷江河谷最早生产和经营蚕丝的人。以上见任乃强《蚕丛考》，载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22—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¹⁹ ①《世本》“秦嘉谟辑补本”第12页：“昌意娶于澗（即蜀）山氏之子，谓之昌僕，产颛顼”。又“张彭梓集补注本”第84页：“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昌意之子乾荒，亦娶蜀山氏”。以上诸说见《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禹“娶妻生子，名启”，“生于（广柔县）塗山”。

²⁰ ②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现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汉巴郡胸忍令景云碑》，中有句云：“先人伯沅，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伯沅即伯杼，夏太康之名。太康曾回大禹石纽生地，参加汶川祭祀大禹之会。

²¹ ③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现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汉巴郡胸忍令景云碑》，中有句云：“先人伯沅，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伯沅即伯杼，夏太康之名。太康曾回大禹石纽生地，参加汶川祭祀大禹之会。

²² 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62—164页，有“大型立人像”，“身着三层衣”，“立人身上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最外层为单袖衣”，“衣上佩有编织的长绶带”，“衣上阴刻纹饰，左侧是两组相同的龙纹”，“龙身上饰有联珠纹”。“衣右侧前后各有两组”“横倒的兽面纹”和“简化的虫纹和回纹”。“中间一层短衣”，其“后背左侧有一龙纹”。“内层衣最长，长袖”，其“前后裾纹饰”“分上下两组”，“上组纹饰为虫纹和回纹”，“下组为兽面纹”。该书为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又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青铜器”卷，天地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8页1大立人像；第29页1—1大立人像正面衣饰；30页1—2大立人像左侧衣饰；31页1—3大立人像后面衣饰；32页1—4大立人像右侧面衣饰；33页1—5大立人像正面下半部衣饰；34页1—6大立人像背面下半部衣饰。又见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249页，250页。赵认为该青铜大立人像是“头戴双层高冠”“上层似为软冠”，“下层冠为硬冠”，“铜人身穿三层华衣”，外衣“颇似后世帝王的龙袍”，中层衣“好似燕尾装”。以上著录，均未说出所穿服饰的质料。依绣纹看，应为丝料方合理。

²³ ⑤齐地自春秋以来，丝麻织品，“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齐郡临淄曾专设“三服官”管理三服织室作坊。（《汉书·贡禹传》）“三服”指春冠纁纵服，夏轻绡服，冬纨素服。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睢县）专造竞龙文绣锦服。蜀地则“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齐、蜀、襄为两汉时期三大丝绸织造中心。

²⁴ ①山谦之《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

蜀锦蜀绣的得名，也是在秦汉时代产生的。蜀锦来源于“锦绣段”，“段”是在钻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段。段是蜀丝文明的特色产物。^{②⑤}蜀锦有多彩多色的产品。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③⑥}这两句话说了两件事：一是著名产品“贝锦”。贝锦之名见于《诗经》，指织出锦纹好似多色的彩贝，这是汉代蜀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锦只有经过锦江上游的鲜水洗濯，才能出现鲜艳的锦色，优于天下诸锦，故濯锦之江称为锦江，管理织锦作坊的官署在锦江岸边，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所在区域则称为“锦里”。成都有“锦城”的代称，就是从锦官城简称得来的。

汉代丝织品在许多地方均有生产，图案花样丰富多样，如在河北怀安、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古楼兰遗址、诺颜乌兰遗址、蒙古国通互拉汉墓、朝鲜乐浪郡（今平壤）等汉墓中均有彩绘织锦出土，上面织的花纹图案有祥禽瑞兽、吉祥图形或几何图案，图案中往往夹织有隶书的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世如意”“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万年益寿”“万岁宜子孙”等祈家祈年的用语，都是一般家庭使用的吉祥语，可见这是汉代织锦的一种民俗。其中唯有蜀锦蜀绣是不同于一般民俗的特异者。在丝绸之路上，吐鲁番尼雅墓地出土了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蜀锦，共有三段：其中有一段锦织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用语，这是汉代当时王侯合婚类家庭使用的一般性吉语习惯，没有什么特异。特异的是，唯有另两段作为射箭护膊用的织花绣字的蜀锦，在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不同凡响，最有文化内涵和特色。该锦膊图案花纹，按横幅排列成横行。在两横行之间则有龙、凤、马、虎与五星的彩色图，两端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其内涵超过了一般家庭祈福用语，是用的《史记·天官书》的话：“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⑤当时汉代人的看法，日月五星的天象方位，是与地上物象人事的动作相对应的，特别是同国之大事“祀与戎”有关，这叫做“天人之符”。^⑥“五星”有两指，一指“天之五官坐位”^⑦，包括“紫宫（中宫）、^{④⑦}房心（东宫）、权衡（南宫）、咸池（西宫）、虚危（北宫）”五星；另一指佐天行德的“天之五佐”，包括水、火、金、木、土五星。前五星为经，后五星为纬，经纬相织，分天之中。^⑧天官的责任，“为天数者，必通三五”，是观察三辰五星经纬交织的中道，以便“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⑨。“天有五星，地有五行”^⑩，观察天的五星与地的五行的位置变化，可以决定国家的军事征伐行动。如果“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⑪，“积于东方”则利于出兵讨伐分裂叛乱势力，“其赤，中国胜”^⑫，“可以礼致天下”^⑬。两汉三国时期，南羌土豪常有分裂叛乱，因此要选五星聚于东方一舍之天象时加以讨伐，这是大有利于中国大一统的时机。今天看来，蜀锦这段话，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体现当时制作蜀锦的蜀人对于文化中国共同体大一统理念的认同来解读。古代蜀人具有擅于把这种理念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出去的认知能力和宣传手段，这就大大超出了其他地区织锦只有锦绣吉祥语的精神境界，体现了蜀人的文化历史自信，能注重工艺品制作以文化为魂。所以我们说它是汉代织锦中最具文化精神和深刻性内涵的丝织品。

生产蜀锦的纺织工具也出现了奇迹。汉代出现了高级提花机代替手工刺绣，但这只见于文献记载，或画像砖的织机形象。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绘有织布机和织丝机两种织机的形象，但都没有实物。^{⑤②⑧}近年来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和14个纺织工匠的漆木彩绘人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锦缎丝织提花机模型，代表当时最高超的中国织锦技术，用实物场景表现了蜀锦织机作坊生产的全过程。从织机实物可以看出，它采用的是“高楼双峙”织造经纬密度很大的绫锦技术。这种技术一直传承到现代的丁桥花楼织机，仍使用其法。这四个织机模型是蜀锦蜀绣对世界丝织文明起源和演进所作特殊贡献的明证。

²⁵ ②先师徐中舒先生的观点，见“巴蜀文化初论”。中舒先生认为“蜀锦古代称为锦段”，“张衡《四愁诗》所说的‘锦绣段’，也应指蜀锦言”。“《说文》：‘段，椎也’，椎即今槌字。凡椎段之物皆令平滑，所以平滑有光泽的锦，也就被称为锦段了。”“蜀锦应当是古代四川的特产”，“应有它的悠远的历史”，“而不是受中原的技术影响才发展起来的。”其说见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

²⁶ ③左思《蜀都赋》：“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卷四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云：“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锦江之得名，即因此特点而来。

²⁷ ④《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1289页，“索隐”：《文耀钩》曰：“中宫即北极星”。《春秋合诚图》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²⁸ ⑤刘知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第44页图四四，拓有画像砖上的织锦机和织布机形象。织锦机为足踏，织女横坐在织床后端，左手握筘，用筘打紧纬线，前端有卷经线的轴，并与蹻（踏板）相连。这种足踏织机，即后世的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

总之，古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孕育了以蜀锦蜀绣为标志的巴蜀丝织文明，体现了蜀人制作衣饰的特殊智慧。丝绸是文明起源和进步的一个标志。它的起源是与中国文明起源同步的。人类文化始于衣食住行，而衣是文化之首。它从皮革树皮之衣，发展到麻绢丝绸，也是衣饰由文化进步到文明的过程。衣饰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同整体中国文明起源又具有同样的特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和多源性，多个地域是中华民族文明诞生的摇篮，苏秉琦先生谓之曰“满天星斗式”。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在不同地域发生，逐步以中原文化带为凝心聚力的火炬中轴，发展而成燎原之势。这就是中华文明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特色。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支多源组合与重组为一体的重要阶段，表现在服饰文明上遂产生了多元服饰一体化的黄帝正妃嫫祖创制丝绸的口述历史，嫫祖是多地区多源丝绸文明各支凝聚在一起的箭垛式焦点人物，是创制丝绸文明并为各地区丝绸文化高山仰止的标杆，也可说是中国丝绸文明的一个精神标识。由此可见，中国丝绸文明也具有整个中国文明一样的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特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多个地域都有丝绸文明起源的考古遗迹发现和多个嫫祖诞生地并自成一系的传说。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摇篮，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在汉唐时代，世界处于黑暗中世纪的城市衰落时期，唯“扬一益二”，独放异彩，当时通过诸条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和中外人才的交流与中外文化的互鉴，天府四川出现了聚集和集中世界财富的城市，汉唐成都成为世界财富之都、中外人才之都的世界历史都市。与此同时，天府四川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独放异彩的光亮地带。它具有服饰文化起源独特的祖先口述史、独具特色的考古发现和诸丝绸之路上独特商品交换等多重历史优势，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西南出海丝绸之路，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贡献和特殊的历史作用。历代蜀人也最擅长冲出盆地四塞，开拓四面通道，走向外部世界。蜀人渴求外部世界知识、信息和智慧的能力，主动开拓和融入丝绸之路的能力，包括宇宙、总览人物、错综古今、控引天地（蜀人司马相如语）的观察思辨力，曩为外部世界所称道。

历史经验证明：天府之国离不开诸丝绸之路，诸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天府四川。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体系中，天府四川同样离不开，定会承袭它奉献于诸丝绸之路的文明理念、历史优势和历史经验，发挥其独特的古与今魅力，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 [M]．岳麓书社，1983．4．
- [2] 隋书·礼仪志二 [M]．
- [3]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 [M]．
- [4]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 [M]．
- [5][6][7][8][9][10][11][12][13] 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 [M]．中华书局，1963．1328，1351，1350，1350，1342，1351，1328，1328，1318．